

清代云南矿争研究

张 娜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清代前期云南因金银铜等矿产资源丰富而吸引了大量人口入滇开采, 但至乾隆中叶出现矿争。嘉道以来, 长期大规模无序开发导致生态恶果, 云南矿业呈现资源衰竭、产量下降之态, 清政府顺势查封枯竭矿源地, 矿争随之愈演愈烈。到了咸丰、同治年间, 以矿争为导火线而爆发的战乱使云南社会遭受巨大打击——人口锐减、经济凋零、矿厂凋敝, 矿争逐渐沉寂。战乱结束后, 政府设法恢复矿政, 才使矿争得以消弭, 至清末未出现大规模矿争事件。

关键词: 清代云南; 云南矿业; 矿争; 矿产资源; 资源争夺; 资源保护

中图分类号: K249; F4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19) 04 - 0033 - 08

DOI: 10. 14091/j. cnki. kmxyxb. 2019. 04. 006

Research on Yunnan Mineral Disputes in the Qing Dynasty

ZHANG Na

(Southwest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Yunnan province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due to the rich mineral resources such as gold, silver and copper. As for the mid of the Qianlong period, there had been mineral disputes. Till the periods of Jiaqing Emperor and Daoguang Emperor, the mineral resources and production decreased heavily due to the massive disorderly mining,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closed down the overused mines which also led to more intense disputes. Then, in the years of Xianfeng Emperor and Daoguang Emperor, the disputes caused by mines hit this province heavily, involving population reduction, economic recession, mine decrease. After these disputes, there was no large-scale mining disputes to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recovered the mineral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Yunnan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mining industry in Yunnan province; the dispute of the mines; the mineral resources; the struggles of the mines; resource protection

清代是中国矿业的重要发展时期, 而云南作为重要产地之一, 矿争事件却层出不穷。随着资源开发的进程, 云南矿争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发展过程, 并对清代云南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滇矿开发很早就引起历史地理学、中国经济史、清史等学科的学者的高度关注, 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但学界对于清代云南矿产的研究还主

要集中于云南铜矿业的生产性质及其兴衰问题、铜政问题、铜铸和铜运问题、铜矿开发与西南地区关系问题四个方面^{①[1]}。而对于云南矿业的兴衰, 目前学界还更多是从冶矿业的角度分析云南矿业的发展脉络^{②[2-4]}, 未曾有从资源角度探究云南矿产资源的变迁及其引发的矿争问题的研究。基于此, 本文从清代云南矿争的视角, 梳理了矿争的发展脉络与影

收稿日期: 2019 - 07 - 05

基金项目: 201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研究”(17ZDA158)。

作者简介: 张娜(1993—), 女, 云南大理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云南灾荒史、环境史研究。

①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陈艳丽《近三十年云南铜矿业研究综述》。见文后参考文献 [1]。

②如马琦《国家资源: 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 肖本俊《清代乾嘉时期云南矿区的“山荒”与滇铜业的衰落》, 杨亚东《矿业与边疆治理: 清朝对云贵地区矿业衰落的调控》, 等等。见文后参考文献 [2-4]。

响,并探讨了清政府对于矿争事件的应对及其成效。

一、清代云南矿争的背景

云南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开矿谋利。如“滇省从事矿业的回民,为数颇众,富者为‘锅头’,贫者为‘厂丁’”^[5](“锅头”即为“厂主”)。清代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得矿区人丁聚集,“矿地又如市镇,聚集人数,不易估计”^{[6]63}。由于人口构成复杂、各种利益盘根错节,厂民聚居之处容易发生矿争。而矿区人丁的聚集往往会随着矿业的兴衰而变化。“滇省矿旺时,民多聚众,除开矿人员外,其他商贾负贩,百工众技,不远数千里,蜂屯蚁聚,以备厂民之用,而优伶戏剧,奇邪淫巧。莫不闻风景附,觊觎沾溉。探丸挟篋之徒,亦伺隙而乘之。”^{[7]卷44,18}然而,一至矿衰,则弊端丛生。如嘉庆初年,云南矿厂的情况是:“凡厂衰旺,视于众寡,来如潮涌,去如星散,机之将旺,麾之不去,势之将衰,招之不来。故厂不虑矿乏,但恐丁散。”^{[7]卷44,2}

云贵总督林则徐描述了矿区人丁散聚的主要原因,即有利可图则人丁聚集,无利之处则一哄而散:“近年因铜斤产薄,惟恐京运不敷,但有能觅子厂之人,厂员无不亟令试采。若辈行山望气,日以为常,于地力之衰旺盈虚,大都能知梗概,见有可图之利,或以红单而报苗引,或以金呈而请山牌,当其朋集鸠贄,人人有所希冀,要之人事居其半,天事亦居其半。据本地人所言,开而能成,成而能久者,向实不可多得。然第就目前而论,如其地可聚千人者,必有能活千人之利,聚至数百人者,亦必有能活数百人之利,无利之处,人乃裹足。故凡各属矿厂衰旺兴闭,地方官皆不能隐瞒,惟设法经理之人,能使已闭复兴,转衰为旺者,实难其选耳。”^{[8]494}云南人民除耕种外,开采是其一项重要的生计来源,矿工势必有利则赴、无利则散。

此外,开矿产业作为一种特殊产业,无论是主事者还是从事者,大多都具有特殊、复杂的身份背景,大部分绝非弱者。就主事者而言,“开矿是一种投机事业,主共事者,多富有冒险犯难的精神,势非弱类,而探矿之人,更是体强力壮”^{[6]67}。而云贵总督林则徐更是认为:“查向来厂上之人,殷实良善者十之一,而犷悍诡谲者十之九。”^{[8]499}就

从事者而言,矿区作为人口集聚之地,有很多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弊端,如“藏亡纳叛,不问来踪,大愿巨凶,因之匿迹,此为一害也;舍其本业,走厂为非,剪络赌钱,诈骗无忌,此又民之害也;流亡日集,奸匪日滋,劫杀勾连,附彝索保,此又民之害也”^[9]。矿区各类人员杂处,匪徒藏奸,植党分朋,在有争端和恩怨情况下,事态很容易发展扩大。石屏人许印芳描述了矿区的人员情况,揭露临安籍厂民结党营私、占厂肇事成为地方治安之一大害,从中可窥见矿区人员构成的复杂,是地方治理的一大难题:“请看采矿人,家屠本编氓;有桑不务蚕,有田亦废耕。自少习游惰,傲狠若性生;结党号厂客,歃血固要盟;戎装执戎器,击鼓扬旆旌;占厂凭势力,树敌各联营;争夺起边衅,于法当重惩。历官病疴羸,畏虎莫敢撓。隐忍示宽大,养痍患以成。”^[10]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矿区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治安状况不良,因此矿民常以地缘为单位结成矿民集团,成员互相保护,有的还拥有武器,形成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清代云南各拥有铜银厂等州县,经常有棍匪纠众结拜之案,又厂中有烧香结盟之习,故滇谚有云“无香不成厂”(香即香把会)。矿民通过宗教组织——香把会结成了一股强大的利益集团,“即有命盗等案,亦每拒捕殴差,以至民气日悍,目无官长”^[11]。除了由地缘关系结成的矿民集团外,矿区回民一般也会组成各种集团。而汉民也不甘示弱,仰仗人多势众结成矿民集团,与其他集团争夺矿产资源。例如,临安府建水、石屏二县汉人便倚仗人多势众,成为多起矿争事件的肇事方。文献对此记载说:“道光以来,云南诸厂采矿砂丁号厂客者,类皆汉家无赖子,青布缠头,被甲执械,扬旌击鼓,千百为群,目无法纪,官司斥为厂匪。其人多临安府籍,亦称临匪。”^{[12]卷106,22}林则徐曾指出矿民集团是官府治理的难题,“其分也争相雄长,其合也并力把持,恃众欺民,渐至藐官抗法,是以有厂之地,不独官惧考成,并绅士居民亦皆凛然防范”^{[12]卷106,24}。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矿区一旦彼此发生利益纠纷,往往容易发展成大规模的械斗。在各种利益的纠葛下,矿区的治理困难重重。

二、“听民开采”与矿争的肇始

矿产的开发不仅关系着国家币制稳定和经济正常运转,还关系着国家武器装备的优劣和军事实力的高低,是国家的重要经济资源和军事战略资源。因此,云南的矿业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实际上,自元代开始,云南矿业在全国已经占有重要地位。《元史·食货志》记载:“天历元年(1328年),全国岁课统计,云南为数最多,其金、银、铜课均为全国之冠。”檀萃《滇海虞衡志》亦称:“中国银币尽出于滇,次则岭粤花银,来自洋舶,他无出也。昔滇钱盛时,内则昭通之乐马,外则永昌之茂隆,岁出银不貲。故南中富足,利及天下。”清代前期,矿业的开发是云南的重要经济支柱。

随着铸币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对铜矿的需求也逐渐增大,铜矿渐渐供不应求,而这种供不应求的现象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出现。马琦指出,清代前期铜铅产量的供给量虽然在增加,但与需求量之间仍存在差距,而铜的供给明显不足,铜铅矿产供不应求的情形愈演愈烈,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至雍正四年(1726年)两次“铜荒”的出现正是铜铅矿产供求矛盾的突出表现。^{[2]43}面对“铜荒”现象,清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以解决供不应求的危机。

康熙年间,清政府汲取了明代矿冶业官营的各种教训,对云南矿产开采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限制,即实行“听民开采”的政策,即:“清初鉴于明代竞言矿利,中使四出,暴敛病民,于是听民采取,输税于官,皆有常率”^{[13]卷124,7},“夫元明或着纳金之令,或遣开矿之使,法制未能尽善。我朝因天地自然之利,国初时命云南开局铸钱,以便民用。厥后封疆犬吏疏陈矿铜事宜,听民开采,委管监收铜政、钱法”^{[14]卷73,6}。

康熙二十年(1681年),蔡毓荣向清廷上《筹滇十疏》,也提到放宽对云南矿政限制的重要性:“滇虽僻远,地产五金,先经廷臣条议开采,部复将可否开采之处,令督抚查明具题,诚重之也。臣愚以为,虽有地利,必资人力,若令官开官采,所费不貲,当此兵饷不继之时,安从取给?且一经开挖,或以矿脉衰微,旋作旋辍,则工本半归乌有;

即或源源不匮,而山僻之,耳目难周。官民之漏卮无限,利归于公家者几何哉?是莫若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之为便也。”^{[15]卷8,431}另外,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原定云南省属银矿,招民开采,官收四分,给民六分。到雍正元年(1723年),又“禁云南收铜之弊,令商民得以余铜,自行贩卖……凡有官买,悉照市秤市价,出入划一;其额抽税铜,亦令公平抽纳,不许抑勒商民。至产出之铜,除抽税及官买供本省鼓铸外,有余,听民间自行分流通,毋得禁遏”^{[15]卷12,656}。

在这样的开发政策下,云南各大矿厂云集四方人士,有两湖、江西等外省人员前来办厂,也有受雇进入硐槽掘矿的云南本省汉回民砂丁,还有为矿民贩运粮米的商人。这种于官于民均有利的“任民开采,设官抽税”政策,促进了云南矿业的发展,到乾隆年间已经形成了“滇铜丰旺”“商民采挖踊跃”的繁荣局面。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间(1765年至1775年)是滇铜产量最盛时期,每年滇铜除供京省之外,尚拨往邻省贵州以供鼓铸,同时江苏、浙江、陕西、两广等省均相继远道而来采买滇铜。

在矿业繁荣发展的背景下,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银厂、铜厂。较为著名的银厂有南安州(今双柏)的石羊、马龙,开化府(今文山)的白牛和永昌府的茂隆等厂;铜厂则以东川的矿山,巧家的老厂、汤丹、茂隆,易门的万宝等为著名。此外,矿厂还出现了雇佣劳动力。他们所受劳动报酬有两种形式:“其初出力攻采,不受月钱,至得矿时与铜主四、六分财者,名为亲身弟兄,其按月支給工资,去留随其自便者,谓招募砂丁。”^{[16]卷146,23}这种雇佣劳动者为数者不少。

但是,在矿业发展鼎盛的乾隆年间开始出现了矿争。矿争约起于乾隆中叶。乾隆十一年(1746年),云贵总督张允随奏称:“内外各厂,百余年来从不靖。”^{[17]卷269,11670}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据云贵总督刘藻奏,“因汤丹、大碌两厂,民众聚集日众,争端易起,案件渐多,……应建监狱一座”^{[17]卷725,17098}。虽然云南矿争事件时有发生,但清政府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矿争事态的发展。除了在矿区建造监狱以外,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政府下令地方官应加强对矿厂的监督和稽查,以减少事端:“著云、贵、川各

督抚将是否可采,如何设法稽查以防透漏,悉心妥议具奏。”^{[15]卷12,637}

此外,乾隆年间,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限制政策,如规定在“四十里内开采”,以此缓解社会矛盾的爆发。据《皇朝通考》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年),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奏言:“滇省近年矿厂日开,砂丁人等聚集,每处不下数十万人,耗米过多,搬运日众,以致各厂粮价日昂。一日且有无业之徒,籍言某山现有矿引,可以采铜,具呈试采,呼朋引类群向。有米之家借食粮米,名曰米分,以米分之多寡,定将来分矿之盈缩。往往开采数年无益,又复引而之他。有米之家,希图加借,前后并还,终至矿归乌有,米复徒耗,更或予向广员借用粮米,前后挪掩,重利借还,负累殊深。查滇铜关系鼓铸,不容缺乏。已开各厂,不便议停,未开各厂,正宜示以限制。请将旧有之老厂、子厂存留示各厂四十里内开采,四十里外不得任意私开。”^{[15]卷12,636}

虽然矿争事件频发,但清政府认为这一时期矿业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解决了民众的生计问题,且这一时期的矿产资源仍然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贸然封闭矿厂,只会使无业流民更无以为生,更容易滋生事端。因此,乾隆六十年(1795年),清政府仍下令滇省各铜厂照旧开采:“四川、湖广等省铜、铅各厂,均请照旧开采,今滇省采办铜斤,年额仍须照旧办运,且厂民寻苗踩获一厂,费本开挖,始能成礲获矿,若封闭停采,即成废礲,将来开挖更为费力。况每厂砂丁不下千计,一旦失业无归,必致流而为匪,甚或潜踪私挖,又图私铸,是杜弊转足启弊。此事朕早虑及,于事断不可行。所有滇省各铜厂自应照旧开采,毋庸封闭。”^{[15]卷12,637}

上述种种资料说明,清代前期,在清政府的“听民开采”政策下,矿业出现过一度繁荣景象,并早在矿业鼎盛的乾隆年间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矿争,但还不至于引发大的动乱,云南自身的社会秩序及资源储备仍足以应对各种出现的社会危机,国家对于地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也阻止了大规模矿争的爆发。

三、矿争的激化与国家治理

道光年间,官民合作进一步加强了对矿产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这一时期,清政府所设矿官,其职权只限矿课、征购官税和对矿民进行监督与统治等,并不经营矿业生产,而矿厂产品已有很大部分是由民间自由贩卖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四月己巳,上谕军机大臣等:“我朝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处,向有银厂,每岁抽收课银。历年以来,照常输纳,并无丝毫扰累于民。可见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由开采,是亦藏富于民之道。因思云南等省,除现在开采外,尚多可采之处。著宝兴、桂良、吴其浚、贺长龄、周之琦体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场。民间情愿开采者,准照现开各厂一律办理。断不可假手吏胥,致有侵蚀、滋扰、阻挠诸弊。”^{[17]卷404,41339}因此,矿区的人丁聚散较为自由,且大多出于经济利益。这也为矿争的大规模爆发埋下了隐患。

事实上,嘉道时期,清政府施行了任民开采、官商合办、奖励开采等一系列经营政策,并取得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然而,这些在采矿上实行的于官于民均有利的开采政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云南矿业的发展,但也为矿争埋下了种子。而随着盛极一时的云南矿业生产呈急剧衰败之势,各地资源渐竭,生产萧条,滇铜产量下降,矿厂凋敝,解京铜减少,清政府也相继将一些旧矿查封,随之而来的矿争也愈演愈烈。

嘉道时期云南矿争的爆发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但矿产资源的衰落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资源的日益匮乏使得人民的生计难以维持,而又别无他选,只好走上了争夺之路。道光年间云南矿厂衰弱,厂民欠银与逃逸时间频发。据藩司赵光祖详报,“道光二十六年份(1846年),各厂员造报经放领欠银两,逐一确查,加以分别核减,统计各厂有著民欠银六千二十一两零,无著民欠银一万五百两零。复经委员分查,前项无著厂欠,实因各铜开采年久,所出矿砂微薄,厂民亏欠停歇,先后逃逸,辗转辑追,俱已赤贫故绝,成为无著,并无滥放捏饰情弊。除将司库扣存平余银五千三百六十两零,尽数拨调外,实不敷银五千一百四十四两零”^{[8]188}。

道光年间,矿场大减,争夺遂趋激烈。如道光十六年(1836年),“云南永北厅地方,向有银厂,厂中有匪徒绰号孙霸王,素不安静,聚集多匪,该省上司委永善县知县刘斯增往办,该员不能整顿厂

务，又复勒索众炉，人多不服，将孙霸王收为头人，益无忌惮，该知县将伊拏，行至中途，被伊夥党劫去，该知县动练缉拏，该匪等纠千余人，持械拥至官署，将知县并一课长砍伤，抢去课银八千余两，并行李等物，课长遣子具控，该知县始行稟请动兵，该匪等复敢倚仗多人抗拒”^{[14]卷43,27}。

又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林则徐揭露他郎厅的矿争，这是当地金砂资源有限但私采之风盛行从而引发的纠众互斗：“他郎通判所辖之坤勇管曾出金砂，因游民私采斗争，将山封闭，但金砂不时涌现，难免去者复来，又近处勘有草皮银矿，现亦有人偷挖，此次官为督办，必须多兵弹压”，“访有外来滋事之匪首黄应倡，于上年十二月间未经奉文开采，即欲恃强先来挖矿，率伙盘踞骂泥街。该处居民被其扰害，协力驱逐。本年二月初间，与其党邱纲，移至戛楚地方，复图占扰。”^{[8]519}

面对矿产资源衰竭的矿区争端，清政府相继将一些地方的原有旧矿查封。嘉庆五年（1800年）七月，以硐老山空封闭云南永昌府属茂隆银厂；嘉庆九年（1804年）四月，封闭云南红坡、乐吉古银厂。此类查封旧矿的记载在《清实录》中屡见不鲜。上述旧矿被封闭的原因，除了“以硐老山空，矿砂无出”外，更重要的还是，如继续开采，矛盾和冲突只会与日俱增，即“若仍照旧采办，不特虚费功课项，终归无著而案集丁夫，亦恐滋生事端”^{[14]卷45,6}。

随着清政府相继将一些旧矿查封，矿区民众的生计问题日益凸显。由于旧有矿厂多处被撤，新开矿源又很有限，所剩几家大矿厂家如石羊银厂、马龙银厂和他郎金矿厂等，已明显不能容纳数以万计生活无着落的失业矿工，而此时各地矿厂硐源已多为官吏、豪富所垄断，加之矿井经多年开采资源枯竭、管理不善、工费益繁，矿民多已失业，大批矿丁流散他地生活无着，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据统计，“嘉庆年间依铜矿为生之人，当在十五万人左右，道光时期则降为五万，至少有十万人因而失去生计”^{[6]331}。

由于矿争事件的此起彼伏以及大量民众生计的丧失，对矿争的治理也被提上了章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云贵总督林则徐为矿区治理制定了四条章程，以减少矿争的发生，即“宽铅禁，减

浮费，严法令，杜诈伪”^{[8]498}。一为宽铅禁，即放宽对黑铅售卖的禁令。以前矿厂开采中的所产的黑铅，虽为脚料，但由于其可以制作军火，民间私下出售会被治罪，因此均被丢弃，这加重了厂民的亏折，现在应当准予通商，以此补厂民之亏。二为减浮费，即裁减对矿厂的课税。云南各厂都有厂规规定了课税，但随着矿业的发展，名目越来越多，剥削愈来愈严重，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现在虽不能尽数裁撤，但亦必须大减。三为严法令，即加强对矿区出入人员的搜查，对结党作乱、扰害秩序的厂匪处以惩罚，并严格检查来往厂上之人，对其所用铁器，除锤凿、锅铲、菜刀准带外，一切鸟枪、刀械全部搜净后方能准许入厂。另外，“设立枷仗等刑具，有犯先予枷责，或插耳箭游示，期于小惩大戒。若厂匪胆敢结党，仇杀多命，闹成巨案，或恃众强奸盗劫，扰害平民，责令该府州厅县会同营员立即兜拿务获，审明详定之后，请照现办迤西匪类章程，就地请令正法，俾得触目警心，庶可惩一儆百”^{[8]499}。四为杜诈伪，即杜绝诈伪之徒哄骗钱财的事件。滇省矿厂有狡诈之徒，经常以哄骗油米为手段，在矿砂中择其极好净块，如俗名墨绿及朱砂、荞面之类的矿石，作为样矿示人，以利益引诱怂恿他人出资本承办开矿，从中牟取利益，为害颇深。对于这种欺骗行径，政府应该首先出示谕禁，如嗣后查获此等匪徒，更要加重惩办。

另外，道光年间，由于矿区地形及人员的复杂，治理矿争一般主张任用熟悉厂地夷情之人员。云贵总督臣林则徐向清廷推荐任用熟悉厂形的李德生治理云南东川府巧家的矿厂，缘为“该厅地连川界，汉夷杂处，且三面皆环铜厂，最易藏奸，必须熟悉厂地夷情之员，方足以资治理”，“查该员精明干练，朴实老成，以之升补东川府分防巧家同知，洵堪胜任。……且巧家厅亦属夷疆，兼之三面俱环铜厂，该员处处曾经亲历，熟悉情形，于厂地实为得力”^{[8]328}。

出于矿厂人丁“殷实良善者十之一，而犷悍诡谲者十之九”^{[8]499}，因此清政府加强了对矿丁的控制和约束，选择殷实良善之户人为领头人，由其招募砂丁，并进行逐层约束、互相监督，即“窃臣等前经访知他郎厅之坤勇管出有矿硐，当即钦遵谕旨，试行开采，拟选殷实良善之户作为头人，招

募砂丁，逐层约束，并以前此偷挖滋事驱逐复来者，亦当访拿究办，以示惩儆”。此外，对人员编制也有严格的规定：“会议章程十余条，并将在厂各项人丁名册，查明籍贯年貌，详细开报，核其逐层管束之法，每砂丁二十五人，设有丁目一名，每丁目十人，复设丁长一名，积至砂丁一千人，另设总头一名，而仍选立客长五名，总司稽核。”^{[8]493}通过这些规定，使彼此互相稽查、互相约束。

但是，这些治理政策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矿争依然此起彼伏。根据文献记载，自1800年（嘉庆五年）顺宁府悉宜银厂（位于今临沧市耿马县境内）发生汉回纷争以后，50多年时间内相继发生重大冲突事件达10余次之多，如云龙州白羊厂案（1821年）、缅宁（今临沧）事件（1839年）、永昌（今保山）血案（1845年）、巧家厅汤丹厂案（1847年）、姚州事件（1847年）、南安州（今双柏）石羊厂案（1854年至1855年）、昆明事件（1856年）等，矿争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嘉道年间，随着云南矿业生产的衰败及矿产资源的衰竭，滇铜产量下降，矿厂凋敝，清政府相继将一些旧矿查封，导致大批矿民失业，大批矿丁流散他地生活无着。这种衰败趋势已不是仅凭地方官员的一道奏令或者朝廷下谕的一纸空文所能制止，其社会问题日趋严重，随之而来的矿争也愈演愈烈，成为后来咸同年间由于矿争纠纷而酿成战乱的渊藪。

四、咸同兵燹与矿争的涨落

清代云南的冲突，主要以争夺矿产、水、土地等资源而酿成不幸的流血事件为主，其中又以争夺矿产资源的斗争最为突出。咸同时期，由矿争所导致的流血事件在银厂、铜厂、金厂等山地矿厂屡有爆发。

咸同时期，国内银贵钱贱现象突出。受其影响，铜矿开采受到一定抑制，而金、银矿作为贵金属难免更多地吸引开矿者的注意力。云南一些矿业经营者为了争夺金、银矿的开采权，相继发生一系列矛盾。如1854年南安州石羊银厂案因借贷私争引起事态扩大，厂民邀约临安汉人潘德等介入争端，爆发冲突。

此外，咸丰初年，云南绿营兵多次调往外省镇

压太平天国起义，导致省内军事管控能力下降，也使得咸同年间矿争的愈演愈烈。吴文镕任总督时，清廷传旨挑选“云贵精兵各200人，赴援两湖地区，充实清军兵力”^[18]。贵州爆发苗民、教民起义后，云贵总督恒春从云南抽调军队统带前往镇压，因此在1856年省城的“昆明事件”发生后，云南巡抚舒兴阿向清廷告急称：“云南绿营兵奉调出省，省城兵力空虚，无力控制局势，滇省官兵连年奉调出师，所存较少，实觉不敷派遣，地方招募练丁，亦属权宜之计，经费既虞不给，将来流弊亦多。”^[13]据资料显示，“康熙年间，定云南绿营兵额42000人，后经裁汰减额，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为39762人”^[18]，但到咸同年间云南大起义之前，云南的兵力已大幅度下降，“咸同云南反清大起义前绿营额设马、步战兵37000多人，外调援助他省的兵员已达5000多人”^[19]。这必然造成省内兵力空虚，在管控民众武装抗官事件时举步维艰，中央管控地方的能力也因此受到严重削弱。

咸丰四年（1854年），楚雄石羊厂爆发了大规模的矿争，成为了云南回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索。这一时期，云南各地的矿争纠纷先由小规模争斗逐渐到地域性械斗，最后演变为全省范围内大规模的械斗风潮。到1856年（咸丰六年）杜文秀起义前，冲突已由偏远矿区蔓延至农村、城市，其地域从海西大理府、顺宁府、永昌府蔓延至东川府、楚雄府和省会云南府。

咸同战乱发生以后，在战火硝烟下，各地矿厂凋敝，矿业进入了停滞阶段，战乱导致大规模的矿产停办。据统计，“咸丰乱起后，云南矿厂停办者达百分之八十。可能为军需之故而未停办，亦可能部分停办。若以厂为单位计算，则九十九厂之中，只有二十厂未停办，停办者约占五分之四”^{[6]332}。当时，产量最大的铜矿厂，几乎全部停挖。严中平认为：“这十八年里各地矿硐一律封闭，云南全省会无一斤铜之出产。”^[20]丁文江指出，自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三年（1856年至1874年），未尝炼一斤铜，一担之铅，“又列有金厂四，银厂十八，铁厂十三，锡厂一，朱砂厂一，全部停办。铅厂五，未提停办者仅一。至于硝厂十六处，磺厂三处，则全部未提停办”^{[7]卷43,5}。

云南从前厂旺利丰，三江、两湖、川广的富商

大贾大量来滇开采，但军兴以来，户口凋零，衣食不足，更无余钱以牟厂利，厂务便逐渐废弛。云南巡抚岑毓英奏略：“滇省原有铜厂三十八处，向由官预支工本。自军兴以来，厂地屡遭蹂躏，炉户砂丁逃亡殆尽，各厂槽硐或被荒土填塞，或为积水淹没，废弛十有九年，各厂炉舍器皿，荡然无存，油米柴薪，无不昂贵，加以户口凋零，商贾逃亡过半，驮马稀少，据熟悉厂务之绅士牟正昌等公禀，承认招募砂丁、炉户，先由茂隆、宁台、得宝坪、万宝四厂，办解京铜一百万斤，各厂原定铜色高低不齐，请一概照部定，改为蟹股八五成色，请酌添铜价运费，并暂行停抽铜课等情。”^{[7]卷45,7}这便是军兴以来，厂地屡遭蹂躏、矿厂废弛的情况。

战乱期间除了饥谨外，还有瘟疫的流行。由于难民纷纷逃居于山野丛林，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因此很容易招致疾病；而被困于城内者，因民众聚集，得疾疫流行而死者亦甚重。人口的大量逃亡与死亡，也推动了矿争事件随着战乱的发展而消失。云南总督岑毓英奏称：“查滇省铜政情形，其艰难窘况，实非有意料所能期者，频年以来，厂户之应召无人，开采则大矿绝少，加以兵燹之后，疫病流行，人畜复多损亡，作辍因之靡定，至食用之贵，炭薪之难，日更增甚，见照变通本脚，办理且犹赔累频呼，若再勒令改复定章，人心必为涣散。”^{[7]卷45,5}

战乱平定后，清政府多方设法重办矿厂，如同治十三年（1874年）滇省铜厂官督商办。而光绪五年（1879年）由于绅商亏折甚巨，铜厂又改归为官办。光绪五年（1879年），岑毓英奏称：“臣思权宜之计，本难持久，而事权不一，貽误尤属，可虑因将翁道鸿调办采访局务，所有京铜事宜，仍责成藩司经理，并将东川之茂隆厂、永北之得宝坪厂、易门之万宝厂该归地方官分别经理，以符定制。”^{[7]卷45,6}

光绪年间对于矿政的整顿，避免了咸同兵燹之前铜政的大部分弊端，也有效地阻止了矿争事件的爆发或矿争事态的扩大，尤其是官商并办。光绪八年（1882年），岑毓英奏请“拟仿照公司，广招商民凑集股份，宽其年限。厂今拟仿照饬驻厂委员，但经访获新山，即便备齐油米，招集砂丁以次攻采，发堂之后再行挠撙炉置器，所有铜斤一半归官，一半发价收买，按旬册报藩司衙门，以备查考。金银各厂，一律准此条约计”。光绪年间，通

过官督绅办的方法，既可富国又可裕民，人民的生计得到了保障，矿争也才能有效缓解。

总而言之，咸同年间的战乱，虽然是以矿争为导火索而发展起来的，但战乱的扩大也使得人民大量流亡与死亡，矿厂凋敝，矿争随之进入了停滞阶段。在清政府的治理下，云南矿业终于在光绪年间得到一定恢复。而清政府鉴于前朝弊端，以及由于矿争治理不当而引发的战乱的教训，因此整顿了对矿务的管理方式，这从根本上阻止了矿争向恶态发展的可能性。此后直至清末，云南再未有大规模的矿争事件爆发。

五、结语

清代云南的矿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滇省矿产资源的极度紧张和匮乏，这是清代以来长期大规模开发导致的生态恶果。人民生计的丧失，必然会走上争夺的道路，为社会的动乱埋下隐患。虽然早在乾隆年间，已经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矿争，但由于云南自身的社会秩序及资源储备仍足以应对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国家对于地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也阻止了大规模矿争的爆发，矿争还不至于引发大的动乱。而到了嘉道年间，随着云南矿业生产的衰败及矿产资源的衰竭，矿厂凋敝，大批矿民失业，矿丁流散他地生活无着，加上清政府相继又将一些旧矿查封，随之而来的矿争也愈演愈烈，其衰败趋势已不是仅凭朝廷或地方官府下达的一纸诏令所能制止。

直至咸同年间，以矿争为导火线而爆发的战乱使云南社会遭受巨大打击，人口锐减，经济凋零。咸同年间的战乱，一定程度上就是滇省矿产资源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以矿争为肇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战乱在全省范围内的爆发也使得矿争随之进入了停滞阶段。战乱结束以后，清政府汲取矿争引发战乱的教训，重新整顿对矿务的管理，此后直至清末都未有大规模的矿争事件爆发。资源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重要要素，理论上这个要素能够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但是如果开发利用不当，对资源的争夺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乱反而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在对资源的利用时，还应该统筹好资源开发的度与利益的诉求以及国家治理之间关系。

[参考文献]

- [1] 陈艳丽. 近三十年云南铜矿业研究综述 [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5 (1): 60-65.
- [2] 马琦. 国家资源: 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3] 肖本俊. 清代乾嘉时期云南矿区的“山荒”与滇铜业的衰落 [D]. 昆明: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2011.
- [4] 杨亚东. 矿业与边疆治理: 清朝对云贵地区矿业衰落的调控 [J].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5): 103-110.
- [5] 马生凤. 婆兮事略 [M] //中国史学会. 回民起义 (二).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53: 46.
- [6] 王树槐. 咸同回民事变 [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0.
- [7] 续云南通志稿 [M]. 王文韶, 唐炯, 纂修. 光绪十七年 (1901 年) 刻本.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901].
- [8]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 林则徐文集: 第四卷 (奏折卷) [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 [9] 倪蜕. 复当事论厂务: 丛书集成续编第 120 册 [M]. 台北: 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8: 654.
- [10] 许印芳. 五塘诗草: 卷一即事呈郡守方伯熊先生 [M] //中国史学会. 回民起义 (一).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25: 59.
- [11] 贺长龄. 耐庵存稿 [M] //中国史学会. 回民起义 (二).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53: 28.
- [12] 云南通志 [M]. 岑毓英, 修. 陈灿, 纂. 光绪二十年 (1894 年) 刻本.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894].
- [13] 赵尔巽. 清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14] 云南通志 [M]. 阮元, 纂修. 道光十五年 (1835 年) 刻本.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835].
- [15]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M]. 木芹, 徐文德, 郑志惠, 校订.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 [16] 新纂云南通志 [M]. 龙云, 卢汉, 周钟岳, 纂修.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刻本.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901].
- [17] 清实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8] 吴养. 文节府君 (吴文馆) 年谱 [M]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146 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344.
- [19]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 卷一 [M]. 奕訢, 修. 北京: 中国书店, 1985: 67.
- [20] 严中平. 清代云南铜政考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

(上接第 32 页)

[参考文献]

- [1] 鞠明库. 抚按与明代灾荒救济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3 (1): 126-130.
- [2] 闵洪学. 抚滇奏草: 卷九 [M]. 剑桥市: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1625].
- [3] 王春桥. 闵洪学《抚滇奏草》考述 [J]. 学术探索, 2017 (7): 100-104.
- [4] 朱泰祯. 云中疏草 [M]. 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 [1625].
- [5] 朱端强. 闵洪学与《抚滇奏草》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 182-187.
- [6] 刘文征. 滇志 [M]. 古永继, 校点. 王云, 尤中, 审定.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1.
- [7] 朱泰祯. 云中疏草: 卷四 [M]. 明刻本. 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 [1625].
- [8] 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云南省历史洪旱灾害史料实录: 1911 年 (清宣统三年) 以前 [M]. 昆明市: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8: 30.
- [9] 刘建华, 温克刚. 中国气象大典: 云南卷 [M].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06: 262.
- [10] 洱源县水利电力局. 洱源县水利志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5.
- [11] 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昆明市志: 第一分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98.
- [12] 朱泰祯. 云中疏草: 卷一 [M]. 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 [1625]: 44.
- [13] 吴琦, 杨露春. 明代地方监察体系与荒政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6 (6): 30-35.
- [14] 李东阳. 大明会典: 卷十七 [M]. 申时行, 修. 明万历十五年内府刊本. [出版地不详]: [出版社不详], [1587].
- [15] 朱振刚. 明代云南荒政史概述 [J].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22 (3): 27-31.
- [16] 新纂云南通志七 [M]. 牛鸿斌, 点校.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 443.